

孙中山

与辛亥革命史研究

——庆贺陈锡祺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

◇陈胜彝 主编◇

中山大学出版社



孙／中／山／与／近／代／中／国／学／术／系／列

· 孙中山与近代中国学术系列 ·

孙中山

与辛亥革命史研究

◇ 陈胜群 主编 ◇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 庆贺陈锡祺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

中山大学“211工程”建设经费及
广东省新闻出版局重点图书资助出版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研究:庆贺陈锡祺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陈胜
彝主编.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1. 10

(孙中山与近代中国学术系列)

ISBN 7-306-01849-3

I. 孙… II. 陈… III. ①孙中山(1866~1925) - 革命理论 -
研究 - 文集 ②孙中山(1866~1925) - 人物研究 - 文集 IV.
D693.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2880 号

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编:510275)

电话:020-84111998、84037215)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南海系列印刷公司印刷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市东下路 6 号 邮编:528200 电话:0757-2233651)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20.5 印张 3 插页 540 千字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定价:43.00 元

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代序

金冲及

在中国当代学者中，对孙中山研究工作贡献最大的当推陈锡祺教授。这大概是学术界的公论。

陈锡祺教授长期在以孙中山命名的中山大学任教。几十年来，尽管遭遇过不少磨难，甚至受到过一些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始终孜孜不倦、锲而不舍地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倾注到孙中山研究工作中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他在1957年出版的《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一书，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研究孙中山的专著，在这个领域内起了开创风气的作用。这本书出版后不久我就读过，得到很多教益。举个例说，现存的孙中山最早作品《致郑藻如书》是研究孙中山早期思想的极为珍贵的资料，但以往流传极少，从没有被学者注意和引用过。我就是从陈先生这本著作中才第一次得知它的重要作用。可惜的是，这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陈先生由于身体健康和当时政治环境的缘故，没有能充分实现他的抱负。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结束后，已经年逾花甲的陈锡祺教授仿佛重新焕发出一个年轻人那样的青春活力来。他多年的宿愿终于渐次成为现实。1979年春，中山大学成立了孙中山研究室，由陈先生担任第一任主任。同一年，在纪念孙中山诞生113周年的时候，陈先生主持召开了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次以孙中山研究为主题的学术盛会，有不少海内外学者参加，在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响。接着，陈先生领导的中山大学孙中

山研究室同其他研究单位一起，先后编辑出版了《孙中山年谱》和数达 11 卷、共 500 多万字的《孙中山全集》。在海内外举行的多次孙中山学术讨论会上，他经常发表很有分量的学术论文。更使人高兴的是，在纪念辛亥革命 80 周年时，出版了由陈锡祺教授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这部巨著的编写，历时十年方告完成，共 150 多万字，无论资料搜罗之宏富、叙事之翔实、考订之精审、对已有研究成果之吸取，都是以往同类作品难以望其项背的。

人们常说“文如其人”。陈锡祺教授的治学态度同他受人尊敬的人品一样：严谨，有原则，任何时候都一丝不苟。他总是提倡研究工作者要从掌握大量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出发，考虑到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实事求是地作出独立的判断。拿收入这本集子中的《关于孙中山的大学时代》一文，全文视野宽阔，剖析入微，是研究孙中山早期思想和活动不能不读的重要文章。在陈先生的其他论文中，对近年来海内外孙中山研究工作中接触到的重要问题，几乎都毫不含糊地坦陈了他经过深思熟虑后的看法，从不迎合时尚或轻易苟同。即便是极左思潮和其他错误思潮泛滥的年代，他仍是一如既往，一本初衷，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孙中山，得出自己的结论，不为外界的某些干扰所动，表现了史家肝胆、学者风范。

在谈陈锡祺教授对孙中山研究工作做出的贡献时，不能不说到：他不仅自己长期潜心研究孙中山一生的事业和思想，而且悉心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在这方面做出重要成绩的学者来，如黄彦、陈胜藩、方志钦、段云章、林家宥、邱捷、周兴樑、桑兵、乐正、贺跃夫等。陈先生对自己的学生在专业上严格要求，而在生活和工作上爱护备至，在这方面我听到过不少感人的事迹。凡是我所认识的陈先生的学生，对他没有一个不是十分尊敬的。这样的师生关系，在学术界似乎也并不多见。广东是我国研究孙中山的学者最集中的地方。他们中有的虽没有直接受业于陈先生，但也常常把自己看作陈

先生的学生，如在孙中山研究中有突出成绩的广东社会科学院院长张磊便多次对我这样说过。陈先生还一直提倡在研究工作中一定要团结协作，这也许是广东学者们近年来能在孙中山研究工作中做出那样多成绩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对陈锡祺教授心仪已久。从 70 年代末期起，几乎每年都有机会同陈先生相见，听过他在国际和国内学术会议上的许多次讲话。初见时，觉得陈先生是一位严肃的长者。但稍多接触后，很快便发现，在他清癯沉着的外貌背后，深藏着的却是那样热烈而真挚的感情。陈先生待人谦虚和蔼，但一谈起孙中山，他就往往禁不住内心的激动。特别是当说道孙中山的历史功绩，或者他认为对孙中山作出的评价不公平时，他那种激动便自然地溢于言表。

有人说历史学家不应该带着感情研究历史，感情同科学会发生冲突。这话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不能把感情同科学完全对立起来。感情并不等于偏见。历史学家也是人，而人是不能没有感情的。陈先生从不讳言孙中山的弱点和失误，并在这方面作过许多中肯的分析，但他对孙中山确实充满了感情。这是对伟大革命先行者的感情，是对这位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的感情，是发自一位善良而正直的学者内心的感情，而不是只出于个人的偏爱。

历史学家固然和诗人不同，他所研究的对象是客观历史事实，而不是着重抒发个人的激情；但历史学家对人类的历史，特别是自己民族的历史决不是冷冰冰的、无动于衷的旁观者。他对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善恶正邪，应该有自己的判断，有鲜明的爱憎。一部近代中国历史，是无数志士仁人为着“振兴中华”这个崇高目标，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进行可歌可泣斗争的历史。历史上的许多人和事，往往会使历史学家受到感动。正由于历史自身感动了历史学家，才驱使历史学家能够写出动人的历史来。陈先生为张磊《孙中山论》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始终认为，任何一个民族，在研究自己伟大历史人物时，必定会自然流露出一种感情。

这种感情，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推动研究的动力。”这里表述的是他的真实心情。我们读陈锡祺教授的文章，或是听他的讲话，常能从他的语言背后感觉得到跃动在他胸中的那股深沉的感情的力量。我想，这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应该具有的条件之一。

对我说来，陈锡祺教授一直是一位尊敬的师长。这不仅因为我1947年曾在金陵大学历史系就读，而陈先生早就在那里教过书，更因为陈先生的道德文章使我肃然起敬。在陈先生80华诞到来的时候，他的大著《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集（增订本）》将要出版，要我写几句话。这自然使我感到惶恐，但又觉得不应该推辞。写下这些话，无非只是借以表达一个后学对前辈的仰慕之情。

1992年4月于北京

（原载陈锡祺著《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集（增订本）》，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目 录

陈锡祺教授与《孙中山年谱长编》	陈 铮 (1)
孙中山研究专家——陈锡祺教授	黄云静 (7)
辅仁文社与兴中会关系辨析	贺跃夫 (21)
兴汉会的前因后果	桑 兵 (40)
庚子新加坡“刺康案”探微	李吉奎 (79)
论“十次起义”失败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	马庆忠 (94)
论孙中山在创建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斗争	陈胜彝 (119)
评孙中山 1913 年访日	段云章 (150)
孙中山从联美到联俄	
——共产国际东方政策的必然效应	梁碧莹 (174)
越飞与所谓“孙吴合作”	邱 捷 (194)
关于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几个问题	黄 彦 (216)
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形成	廖伟章 (250)
论“三大政策”的时代性	王 杰 (269)
1924 年孙中山北上的原因探析	刘曼容 (293)
孙中山国民革命纲领的实施与广东社会阶层变化	丁旭光 (308)
晚清甲午至辛亥间的孙中山与知识分子	黎仁凯 (322)
孙中山与西方基督教	周兴樑 (335)
孙中山与帮会三杰	
——一个“和而不同”的个案研究	陈剑安 (355)

孙中山与美国侨领黄三德

——兼评黄撰《洪门革命史》……………王禄斌 (368)

爱国华侨在经济上对辛亥革命的支持和贡献……………郭景荣 (392)

论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张磊 (428)

从三民主义演讲看孙中山的近代化构想……………钟卓安 (488)

人生观的革命从孙中山开始……………方志钦 (495)

孙中山与“人学”……………林家有 (509)

论孙中山的建党主张

——兼论民权主义……………骆宝善 (521)

论孙中山开发长江流域的宏伟规划……………萧致治 (533)

孙中山的理想与 NIC_S 的现代化实践

——经济发展战略的思路比较……………乐正 (547)

孙中山与近代大同学说的终结……………吴义雄 (577)

孙中山西北铁路计划及其在民国史上的命运……………赵立彬 (598)

孙中山与国家统一……………曹天忠 (612)

孙中山文史图片考释……………余齐昭 (621)

后记……………陈胜舜 (642)

陈锡祺教授与《孙中山年谱长编》

陈 铮

陈锡祺教授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以下简称《年谱长编》)于1991年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之际,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0年来,该书先后荣获:

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历史学一等奖;

孙中山基金会1949—1992年中国大陆孙中山研究与文艺创作优秀成果学术著作一等奖;

国家新闻出版署直属出版社第一届优秀图书奖编辑一等奖、装帧设计二等奖。

《年谱长编》的全体编撰人员为该书付出了辛勤劳动,全书主编陈锡祺教授对该书的编撰和出版所作的贡献,更是有口皆碑。笔者荣任该书的责任编辑,对此体会尤深。以下谈些关于陈锡祺教授与《年谱长编》的编撰出版的情况和个人感受。近20年来笔者均尊称陈锡祺教授为陈先生,下文依然如此。

一

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为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统一、富强奋斗终生。他的一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著作,历经曲折的革命斗争。孙中山先生逝世后,陆续出版了众多的孙中山著作集,从1927年起,也有若干种纪录孙中山先生生平的年谱或年谱长编问世,其中以80年代台湾出版的《国父年谱》增订本的

内容较为充实。

新中国成立后，60年代出版了《孙中山选集》，80年代出版了《孙中山全集》。50年代初，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等编就一部《孙中山年谱新编》油印稿，1980年出版的《孙中山年谱》就是在这本油印稿的基础上，经过修订，刊登于《中山大学学报》征求意见，再进行修改和补充而成的。但这本不到30万字的年谱无法详录孙中山丰富的思想言论和40年的革命活动。因而编订一部内容充实的大型孙中山年谱以满足孙中山研究的需要已成为众多孙中山研究者和一些出版者的共识，而且做好这项工作的客观条件业已成熟。80年代初，《孙中山全集》的编纂和出版工作大致告竣之际，广东省一些孙中山研究者和中华书局编辑部便开始酝酿编订出版《孙中山年谱长编》事宜，得到广东省社科院张磊、张难生、黄彦和中山大学陈锡祺、陈胜彝、段云章、林家有等专家的热情支持。经过广东省社科院和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者的友好协商，确定由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承担编撰《孙中山年谱长编》。

中山大学校领导、历史系和孙中山研究所对编撰《年谱长编》十分关心和支持，很快成立了以陈先生为全书主编的《年谱长编》编撰班子，当时孙中山研究所的主要中青年骨干都投入编撰工作，他们是段云章、林家有、李吉奎、周兴樑、邱捷、桑兵和郭景荣等同志。李吉奎、段云章、林家有分别任一、二、三卷的分主编。这是一支实力雄厚的编撰群体。他们当中大多在孙中山研究方面取得显著成果，有的参加了编辑《孙中山年谱》和《孙中山全集》工作，他们拥戴自己的恩师任全书主编，乐于在陈先生的率领下在第一条线做《年谱长编》的具体编撰工作。这是一支老中青团结合作的编撰集体。

1984年1月，以陈先生为主编的《年谱长编》“若干设想”送交中华书局编辑部，正式约稿告成，双方约定在1991年纪念辛亥

革命 80 周年时出书。该书成为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的重点项目，并被列为国家“七五”规划社科项目和国家教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笔者不止一次听到陈先生对其同事们说，《年谱长编》是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成立后承担的重要项目，一定要努力编好此书，不负中华书局的托付和学术界的期待。当时已是年逾古稀的陈先生，身体欠佳，虽然无法同中青年人一同在编撰工作的第一线，搜集资料，整理编排，但他在编撰群体的组建、编撰指导思想的确立、全书构想的提出、编辑体例的制定，以及整体质量的把关等方面，却发挥了他人无法替代的主导作用。据笔者所知，各卷写成的书稿都要送陈先生审阅，认为有问题的便提出来与编者商量处理，然后交付出版者。

二

就编辑一位人物的文集与编著其年谱而言，文集所收为集主的原著述。集主的著述固然是编著其年谱的基本依据，但仅此是不够的，还要利用史籍的相关记载记录谱主的实践活动，才能全面反映谱主的生平。编撰《孙中山年谱长编》的要求更是如此，充分占有谱主的言论著作和相关活动资料是编撰该书的基础工程。为此，《年谱长编》编撰设想提出所录资料除孙中山的论著言行，收录的范围还包括：19 世纪中叶以来的思潮，国际形势与中国国内状况，谱主家世、生活与国内外社会关系，国际人士对谱主的交往、态度，谱主与本国政党、集团及个人之各种关系，党务发展及重要人物的交往，国内外舆论界对谱主重要活动的反应，以及其他（如各时期与谱主有关人物的思想及言行等）。围绕这个目标，全体编撰者广泛搜集资料，既有常见的孙中山著述和言行资料，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新资料，包括国内外档案、中外文图书、报刊，并在资料的鉴别取舍方面下了很大功夫。1989 年全书编竣交稿。1991 年 8

月这部精装两册的《年谱长编》如期面世，全书 2138 页，155 万字，以时为经、以事为纬，纲目明晰，成为迄今海内外内容最丰富的孙中山年谱著作，全面系统、实事求是地记述了孙中山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丰功伟绩，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关注和赞扬。

三

陈先生是一位治学严谨、为人谦虚、平易近人的前辈学者。

笔者至今依然认为《年谱长编》虽然不是完美无缺的，但还是堪称“精神赅备”。这是和陈先生为首的全体编撰者的治学严谨作风分不开的。例如：1989 年初，编辑部拜读来稿后，认为全稿总体质量教好，仅对稿总的问题提出一些供修改参考的意见。陈先生对此十分重视，他在同年 5 月 5 日致中华书局编辑部的复信诚恳地写到：“我知道，该书稿绝非毫无瑕疵。有的资料在我们编撰时尚未发现，有的则限于篇幅未能收入，此外还可能有其他缺点。我们希望在出版前按贵局的要求将不足之处尽量减少，出版后则待国内外同行的批评指出。……关于技术问题，我们自当认真考虑和接受贵部意见。”在这里，陈先生严谨的学风和虚怀若谷的品德不言而喻了。

毋庸讳言，年事已高的陈先生看到自己主编的颇有分量的《年谱长编》出版，自然极为兴奋和欣慰。然而，陈先生没有把功劳完全归于自己。他一直反复强调说自己老了，跑不动了，编撰的大量工作是年轻人做的，应归功于他们的努力；此时在场的年轻编撰者就会申明，自己的工作都是在陈先生的领导和指导下进行的。是的，一个有权威的、负责任的主编和一批中青年骨干学者密切配合是完成编撰《年谱长编》任务的保证。他们在成绩和荣誉面前互相谦让，难能可贵，令人感动。陈先生对晚辈学者工作的尊重，晚辈学者对陈先生的尊敬，足以说明师生之间情深似海。当年参与编撰

《年谱长编》的诸位中青年学者，早已发展成为知名教授、博士生导师、系所领导。这可以借用“严师出高徒”这句老话吧！

陈先生是辛亥革命史和孙中山研究的前辈专家，笔者久仰，而首次与陈先生谋面是在1981年10月参加在武昌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期间，但这次无缘单独接近陈先生。不久后，由于出版《孙中山全集》和《年谱长编》的工作关系和一些学术活动，笔者与中山大学历史系和孙中山研究所的联系渐多，也有了较多机会走近陈先生，深感陈先生是一位平易近人的长者，体验到先生对自己的关爱。20年来，陈先生有时身体欠安，中山大学历史系和孙中山研究所领导出于爱护陈先生，尽量减少陈先生会见宾客等应酬活动。可是，每当陈先生知道笔者来时，都会破例接见笔者，有时是在先生住宅，有时是在宾馆客房，有时还在医院病房。见面时陈先生总免不了会兴奋地谈起编撰《年谱长编》事宜，就会说许多赞扬中华书局出版该书和鼓励笔者的话。

有一件令笔者难忘的事：《年谱长编》出版后的1992年11月，笔者应邀参加中山大学举办的孙中山研究学术讨论会，会议期间荣幸出席中山大学庆祝陈先生80华诞宴会。笔者进入宴会厅后，在较靠边的一桌坐下。入席后有位中山大学历史系负责人手拿名单，请笔者到主桌就座，并告知这是按陈先生的提名安排的。这是笔者没有想到的。当晚出席寿宴的有许多各级领导和知名学者，实话实说，论资排辈，笔者是没有资格享此殊荣的。不过此时笔者意识到，这是陈先生对一名编辑的厚爱。盛情难却，只好遵从主意，心中充满对陈先生和中山大学领导和朋友的感激之情。20年来，在编辑出版《孙中山全集》，特别是编撰出版《孙中山年谱长编》的过程中，在前辈学者陈先生的培育下，笔者同中山大学历史系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孙中山研究所的许多学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每次去中山大学都有“回家”的感觉。四个月前，笔者又在中山市翠亨村和中山大会见了中山大学的老朋友，还在中山大学校医院受到

陈先生的接见，十分感谢。

谨祝陈先生健康长寿!!

2001年3月16日于北京

孙中山研究专家——陈锡祺教授

黄云静

陈锡祺先生是海内外知名的孙中山研究专家。他从 50 年代开始，即致力于孙中山研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孙中山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之一，并且在此后的几十年里，矢志不移，孜孜不倦致力于孙中山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

陈锡祺先生 1912 年 11 月 11 日出生于江苏省盐城县（今盐城市）。陈家世代务农，父亲勤奋读书，考取清朝最后一届科举的秀才，入庠后以课徒为生，辛亥革命后到南京读法政大学，接受了新思想，回到家乡后以兴学育才为己任，创办了十余所新式小学，后来还创办了一所职业学校，造福地方，享有很高声誉。父亲为人方正，很重视对儿女的教育，他曾说，虽食盐粥，子女教育不可辍。子女亦不负所望，均能兢兢业业，并有所成就。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陈先生当时正读初小，听了爱国人士的演讲，明白了不取消“二十一条”就要亡国的道理。1925 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陈先生来到上海，准备报考中学。他亲眼看到，黄浦江上停泊的外国军舰炮衣拉开，耀武扬威，这使他更为痛恨外国侵略者。

1926 年，父亲积劳病逝，年仅 42 岁。父亲去世时陈先生只有 14 岁，还在念初中，哥哥则正在念大学。父亲的去世使家庭经济

陷入困境，为了能让哥哥顺利念完大学，陈先生只好辍学去木行当学徒，同时帮助母亲照料家庭。辍学对陈先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非常渴望能重新回到学校里去。

1929年，哥哥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家里有了新的经济来源，陈先生得以重返学校，并考上高中。可惜才读了一年多又因病辍学回家。1931年，陈先生到南京一所私立中学插班学习，一年后取得高中文凭。

还在陈先生念高中时，震惊全国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了，全国掀起了反日怒潮，各地学生纷纷组织请愿团、示威团等向南京政府请愿示威，抗议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陈先生当时虽只是一名中学生，也积极参加反日示威游行和清查抵制日货运动。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国民党政府的软弱无能和不抵抗政策，全国人民的愤怒，这一切都深深印在陈先生的心里，引起了痛苦的思索：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备受列强欺侮？怎样才能拯救我们的国家？我能为多灾多难的祖国做些什么？当时的中国，犹如风雨飘摇中的一叶小舟，她的命运如何，陈先生感到一片茫然。正在这时，陈先生在他经常阅读的进步杂志《生活》上读到邹韬奋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引用了著名史学家李剑农的新著《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对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高度评价及李先生对附录《林觉民与妻书》所加的按语，按语说：“假使后来的革命党员都守着这种高尚纯洁的精神，替国民谋幸福，民国当早抵于安康福乐的境地了，何至尚有今日的扰攘。”陈先生读后深受感动，就找来李剑农先生的原著，细读之后，开始对中国近代史感兴趣，萌生了学历史的念头。1932年报考大学时，陈先生又专门找来朋友商量选择专业的问题。这位朋友建议陈先生报考历史学系，认为“通过历史去教育青年，去唤醒民众，最有鼓舞作用”。这更坚定了陈先生学历史的信念。1932年高中毕业后，陈先生如愿以偿，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

武汉大学的宗旨是培养“通人”。历史系学生在这里不仅要学